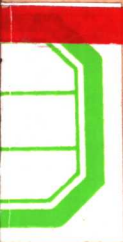


史實與神話

庚子事變百年祭

止庵 著



史實與神話

庚子事變百年祭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止庵著.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7

ISBN 7-5001-0752-8

I. 史… II. 止 III. 义和团运动-史料

IV. 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9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66168639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林燕

责任校对/徐小美

封面设计/长乐

排 版/金海中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625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8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752-8/K·57 定价:15.00 元

序

贾辉丰

维也纳是座美丽的城市。初到时,仍然时时飘风、飘雪。旬日间,就有杂花生树,绿草如茵。老城的露天茶座摆开,人头涌动,一番融融泄泄的气象。走累了,坐下来,喝咖啡,看人。街上的人沉静、平和,甚至有些呆板。遥想当年,奥国也是八国联军的一翼,奥兵进占北京时,当不是这副样子。是时代变了,人性随之改变,还是人性不变,只有时代变了?

如此胡思乱想,只因为日前在看一部书稿,是止庵的《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偶有机会来奥地利盘桓,不谙德文,既聋且哑。文化的隔膜,更加深了异客的感觉。止庵此书,讲的庚子事变,令我与此在竟发生了一点关系。当然,这是侵略者后人与被侵略者后人的一点关系,倒也不是有趣的事。

书却不是白看。行前,止庵塞给我看第一章和后记,嘱我写一点文字,充作序。当时漫加响应。无名,无文,从不曾有人要我作序,这回也只当说说开心。但止庵是个认真之人,来后,他即辗转催问,还借助电子邮件,撒来全部文稿,让我“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虽然只许下半个诺,到此已无计推托。只得想想,写写,敷衍成文,所谓“且战且走”。所写的,也不是批评

文字,因为那并非我能力所及。

拉杂写到此,倒像是为此序作序,还是回到正题。

与止庵的交往,缘于书。最初有人给我看《樗下随笔》一书的手稿,读罢,不禁惊异,何以文字如此沉稳,不似坊间时文那般花团锦簇,竟是有意洗尽铅华。由文而人,结识了当时守着一棵臭椿树、在窗下写书的止庵,从此时有过从。

止庵藏书,我亦有同好,彼此就多了一重话题。然而我之藏书,终不能免俗,买过,翻过,插架了事,“贩掠”而已。止庵用力却勤,如他所说的“瓜蔓抄”,由此及彼,直溯本源,见识就广大。明末王季重、近人顾随,都是浅学如我,闻所未闻,而由他介绍给我。

近年来,受他的怂恿,多买些前人的笔记看。初时略不经意,后来发现,清人的东西,竟占了很大比重。或是因为年代不远,虽属前尘旧蜕,终究易于保存。其中,时有记载清末时局、包括义和团民变的断片,读来令人感慨。有名人说,历史经常重复,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中国历史悠久,但似这样朝野一起乱来的事,除了义和团,恐怕只有文化大革命差可比拟了。奇特的是,义和团这段历史,从一登场,就像一出闹剧。民亦昏昏,官亦昏昏,谁都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义和团喧呼“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朝廷时至兵临城下,仍不图救国之策,惟在宣战诏书中喋喋“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不能欺人,只有自欺了。否则,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当不致相信,凭血肉之躯,掐诀念咒,就足以对付立足现代科学的坚船利炮了。

二次大战时法西斯败亡前遇难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

《狱中书简》中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的缺陷。”惟其愚蠢，乃会自以为是，将蠢事推至极端，小至害人害己，大至祸国殃民。晚清的国事糜烂，除了强敌逼迫，国人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普遍的昏聩，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还有一点，即如鲁迅先生所讲的，民族性中“合群的自大”，而非“个人的自大”。合则群情汹汹，散则畏首畏尾。每个人都掩在众人背后，谁也不去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负责。惟有的几位还具常识的直臣，却给朝廷拉出去砍头了事。

仅此两端，人的无理性，无担当，就足以将一场关系生死的战事，演成儿戏。

如此说来，是否中国就该挨打？这却不是我的意思。侵略与反侵略，有一个根本的是非曲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源于内外交迫的重重原因。华夏自古以来，于民族的存亡绝续，最是认真。爱国主义的一脉，到义和团那里，也还没有死灭。面对外来势力的欺凌暴虐，必有一番拼死抗争。但“灭洋”与反帝，“扶清”与爱国，到底有其区别。等而下之，以愚妄对“诈谋”，以昏蛮对“悍力”，爱国至此，只怕却是爱之适足害之。

止庵此书，即说出了这几重意思。书中多讲了庚子年间，朝野上下的乌烟瘴气之处，或许有人会讥之为“片面”，好在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构筑体系。议论风生，也只为道出对百年前民族怠惰的一种悲哀。百年的耻辱，固不会因此消散，至少可以叫人反省，那能否当作一面旗帜来挥舞。

止庵是诗人出身，为文却另是一个路数。接谈中，他曾与我多次谈起周氏兄弟、废名、浦江清等人的文章，取其生涩，取

其清简,取其平实。我同他谈论文章的好,说到“干净”,止庵又还我一个“结实”。何谓之结实,我想,大约就是言之有物,说理。取事实过来,一层层剖析下去,层层递进,解出真相。甚至在文字上,也不讲究奢华,文章有时作到给人瘦硬的感觉。本来,“燕瘦环肥”,只在个人喜好,并无高下之分。但如今的文坛,肥环如云。止庵的近乎瘦硬,也算在这方世界,别开生面。

还有一点题外的话。止庵是先有一番事业,得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闲时才读书、编书、写书,倒也两不耽误。这样,就多了一重自在,不必为生计卖文,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思,长长短短写下去。文人自来有“穷通”之叹,到底还是俯仰由人。而为文之人,先得能够自家做主,其才、其学、其识,才有了用武之地。

止庵此一书,设想于一九九九年,完稿于二〇〇〇年。一九九九年走了,二〇〇〇年来了。眼见人人翘首以待,但来了的是什么呢,却也没个透彻的说法。说句笑话,至少,跨界的那一刻,“千年虫”先就没来。不过,二〇〇〇年却是庚子事变一百周年的祭年。星移斗转,百年前的炮火、硝烟、血腥气,依旧拂之不去。但愿此书的出版,让人们因此扎扎实实地有一点“来了”的感觉。

二〇〇〇年四月

目 录

序	Ⅲ
第一章	1
第二章	67
第三章	135
附录:辛丑和约	207
大事记	215
后记	231

第一章

这年五月，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向外交大臣写信报告来自义和团越来越大的威胁。信的末尾忽然谈到天气问题：“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静。”^[1]

直隶等省的严重旱灾持续已久。农民生计因此异常艰难，他们脱离土地而投身义和团之类流民运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如果此类外在诱因被消除，情况自然会有所转变。确有这种事例：“时雨又下，文安霸州拳匪，相率回籍。”^[2]“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3]但是从全局看，则仅仅是种企望罢了，正如窦纳乐的信中所说：“然而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说不啻天赐良机。顺便说一句，当后来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贫窶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

窦纳乐的话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可能是在对当时已经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的一种新的逻辑关系作出反应。

其一

神助拳 義和團 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無倫 女行姦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 仔細觀 鬼子眼珠俱發藍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 仙發怨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 非白蓮 念咒語 法真言 升黃表 敬香烟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著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線杆
 緊急毀壞火輪船 大法國 心胆寒 英美德俄盡消滅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球 草木化為兵 惡靈之體
 仙人贊 定滅洋人一掃平
 右傳云山東聖廟抄傳

義和團亂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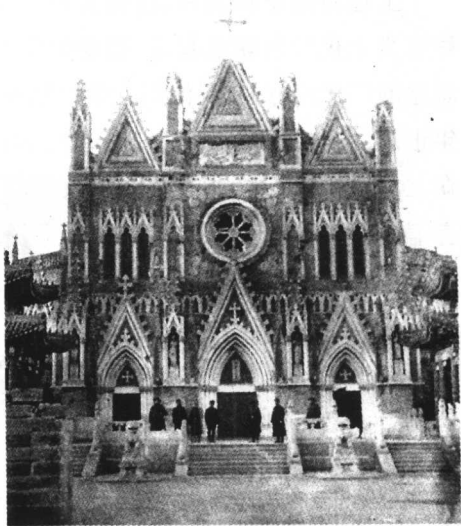
一首出名的義和團亂語，對此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無倫，女行姦，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非是邪，非白蓮，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烟，請下各洞諸

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全，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胆寒，英美德俄盡消滅。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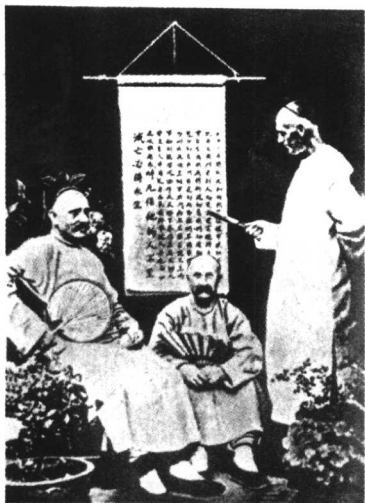
教堂，旱災，以及愈來愈多的義和團焚毀教堂的行動，因此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彼此之間的關聯也變得密不可分：既然教堂（這是一個象徵，它涵蓋着天主教堂及耶穌教堂中進行的各種宗教活動，即如另一份義和團告白所指出的那樣：“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聖，不遵佛法，怒惱天地，收起雨澤，……”^[5]）是旱災久久不能消除的原因，那麼焚毀教堂就成了當下一件要事。持久的旱災又引發其他災害，甚至有瘟疫流行。按照前述邏輯，則無不與教堂等有關：“竊有天主教，由咸

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太而民不安,怒恼天庭。”[6]农民由此激发的对教堂及有关的宗教活动和从教人员的仇恨,是切肤的、极端的,因为旱灾给他们带来的苦难正是切肤和极端的。教堂和教民成为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而只有参加义和团,他们才得以发泄这种仇恨。

焚毁教堂(以及杀死教民)并不排除是出于消除旱灾的功利性目的,这也见载于义和团的有关文献:“灭洋人,甘雨速降。”[7]“不平不能下大雨。”[8]然而其意义恐怕不限于此。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的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干旱等只是它们被亵渎之后做出的反应,是对人间施加的一项惩罚。而针对此种亵渎的一切灭教行为,也就成了神的意志的体现。前引义和团告白在“怒恼天地,收起雨泽”之后即说:“……降下八百万神兵,扫除外国洋人,像有细雨,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参与焚毁教堂,将使自己侧身于



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



外国传教士

“神兵”之列。于是灭教行为的功利性目的有可能让位于另一抽象性目的。有理由相信，焚毁教堂愈来愈不仅仅是为了消除旱灾，它有一种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出来的趋势。教堂始终是义和团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及至进入北京和天津之后，首先要做的即是焚毁当地的各处教堂。这也是攻打西什库教堂何以成为义和团主要战事的原因之一。

上述新的逻辑关系，使得义和团与这场旱灾之间，在另一种意义上也紧密联系起来。运动的发展壮大，显然得益于此种观念的广泛流行，在天津所发生的情况即是一例：“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唯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



外国传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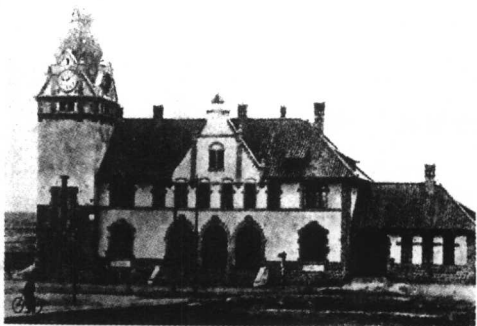
匪渐有立坛者。”[9]不仅为何久旱不雨得到解释,而且偶尔降雨的原因也找到了:“夜,甘雨淋漓,通宵不止,天气凉似深秋。匪党传云,此雨乃义和拳老师用法术所降,以破洋人之红杀阵也。闻者皆叹为神。”[10]疫情的缓解亦以同样道理被纳入新的逻辑系统:“适津郡时疫传染,书符施水,驱鬼降魔,幸而病愈,则传诵灵奇,夸张道法,又为匪徒增焰矣。”[11]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华北地区的旱灾,只是义和团运动的诸多诱因之一。此前山东冠县梨园屯发生的教案,直接导致了义和团(当时还叫做“梅花拳”或“义和拳”)的崛起,乃是缘于教会为修建教堂而与农民之间的土地争端。教堂开始受到冲击,几乎都是出自这类原因。不法教民受到教会庇护,横行乡里,农民对此愤恨不已。除教堂和教民外,铁道是义和团另一主要攻击目标。“拆铁道,拔线杆”,亦见诸前引义和团乱语。高密群众最初围攻德国胶济铁路公司,是因为发生了公司小工倚势侮辱妇女的事件。民间反对修建铁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德人在山东敷设铁道,……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12]铁路的开通将严重威胁传统的运输体



献县天主教堂强占孟超忠等人土地契约

系,历来依靠漕运和陆路运输为生的人们因此有失业的危险。此外洋货也是义和团的破坏对象。洋货的大量进口和海关税率的固定不变,造成中国经济日益凋敝。这一点,那些以出卖自织土布等谋生的手工业者应该有着切身体会。义和团各类排外行为,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到当初的具体原因。另一方面,



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青岛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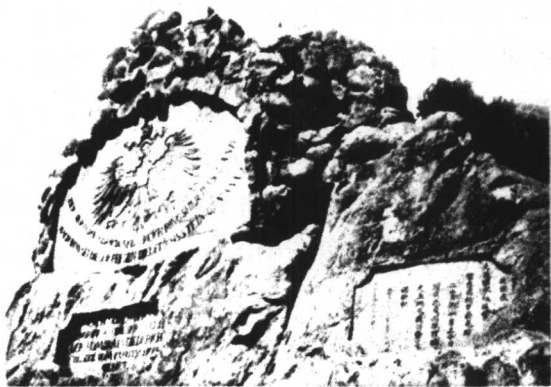
面,贫困、饥馑和对原有生活方式的绝望,如同灾害一样,都促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变成无论什么名义的革命者。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割地狂潮。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继而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俄国占领并强迫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将长江流域划为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势力范围;日本则得到不将福建让与他国的保证。短短几年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身处山东以及直隶的农民究竟耳闻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德军占领胶州湾,对他们来说确实迫在眉睫;义和团纷纷起事及其主要口号“扶清灭洋”的提出,应该说是有针对性的举动。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割地狂潮直接导致了普遍性的针对外国和洋人的愤懑情绪。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正是这种民族情绪的集中体现。虽然大家对运动的结果不无期

待,但仅仅投身这一过程已经大快人心了。

所有这些具体原因,换种说法也就是“人间原因”,都无可否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义和团的主要战场从山东转移到直隶,亦即这一运动获得巨大发展、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之后,在有关文字记载中,讲到烧教堂、拆铁道和毁洋货之类举动,更强调的则是“非人间原因”,即教堂等对神造成的冒犯,和神假手团民对它们施行的报复。前引乩语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这个“因”其实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前述那些具体原因。神这一新的角色的登场,使得种种具体原因退居到相对次要的背景位置。更准确地讲,过去所有那些具体原因都重新得到了解释。例如教堂替代佛寺,铁道破坏坟茔,等等,都成了具有非常意义的事件。发生在人间的一切都被纳入了一个超自然的系统之中。在各处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乩语中,一再强调“时逢大劫”,如:“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13]“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

免,善者方留。”[14]前述一系列具体事件、国人的愤懑情绪以及进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悲观,都归结为这种劫



德国强租胶州湾后留下的纪功石刻



轻气球上鸟瞰天津租界

难,这是神之劫难,也是人之劫难;义和团则承担了弭除劫难的使命:“……军民有灾,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救民。”[15]向来就有“应运而生”和“应劫而生”的说法,分别指正邪两种势力的兴起;然而“劫”与“运”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应运而生”正是“应劫而生”。

在这个新的以神为核心的逻辑系统里,义和团的所有排外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同样,他们所排斥的对象也构成一个整体。虽然此前在山东,当团民与教民为教堂的修建问题发生争执时,也总是以教民与支持他们的外国神父、外国驻北京的使节、当地的清朝官员和军队为一方,以团民与支持他们的义和团伙伴为一方,但是无论哪一方面似乎都还不曾具备这时所有的那种意义。对作为历史上一次运动的义和团来说,这些意

义远远重要于当初(其实此时依然存在)的各种具体原因。当然,在义和团针对教堂、教民、铁道、电线杆和洋货的所有举动中,仍然蕴含着他们出乎前述那些具体原因而产生的愤懑情结。

义和团在山东的前身是神拳,已经具有神的观念;作为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和人-神之间交流形式的“降神”,早在这时就存在了;作为降神结果之一的“刀枪不入”,也被习拳者所相信。就连极力呼吁禁止义和团的人士,也已看出这是其重要特点:“尔等当知习武防身,虽为例所不禁,而义和拳一门,有降神念咒等情,实属邪教,与寻常练习武艺者迥不相同。”[16]但是神毕竟还只是团民自己所有的观念,尚未对于整个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或者说,神的观念尚未发展成为前述那个几乎包容一切的逻辑系统。义和团从山东传入直隶,主要是观念上的传播。一九〇〇年春天,义和团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原因之一当然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裕禄的剿办不力,与此

形成对比的是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前一年底刚刚接替了被认为对义和团姑息



袁世凯(中)